

漫论张泽民散文思想与艺术的正能量价值

吴 周 文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摘 要: 张泽民“文革”前的报告文学《一个震撼人心的午夜》,其思想与艺术的表现是新中国 17 年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新时期《衬衫王国的崛起》等作品抒写了作家张泽民的扬州情结,思想上以“地方志”书写“国家志”,诉求文本最大张力的表现,且注重对人物精神世界进行温暖的揭示与表达。张泽民的散文以报告文学、小说进行跨文体的实验,并在多方面以分寸感的把握,使其作品获得和谐与诗性。

关键词: 张泽民; 报告文学; 散文; 经典; 跨文体

中图分类号: I207.6; I20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030(2014)01-0056-07

张泽民是一名大学教师,同时也是一名学者,作家。他大半辈子供职于前扬州师院中文系以及合并办学后的扬州大学文学院,用他自己的话说,“从苏北师专中文科,到扬州师院中文系,再到扬州大学文学院,可算得‘从一而终’”。^{[1]2}繁重的教学事务与繁忙的系行政工作虽然耗去了他的大部分精力,但他始终放飞着美丽的文学梦想,坚守着作家这一责任。他一生创作了许多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尤以报告文学为最。不久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与散文的自选集《岁月履痕》,则是证明了张泽民难能可贵的坚守。

读张泽民的报告文学给我们的一个强烈印象,就是他的“扬州情结”。他说:“60 年来,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给我以无声的熏陶;扬州丰富多彩的生活,给我以取之不竭的写作素材。我所写的文字,大多是扬州的人、扬州的事,或者与扬州相关的事情,也算是我的扬州情结

吧。”^{[1]2}“扬州情结”,既是张泽民对自己写作的经验总结,也是我们对其报告文学创作机制进行解码的一把钥匙。笔者对张泽民扬州情结的理解有这样三层含义:第一,他是无锡人,从青年到晚年客居扬州 60 年,这生命中最重要、最重要的青壮年之履痕,已经刻留在扬州这片土地上,扬州几乎就等同于他的第一“故乡”了。第二,他在扬州这个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接受大学教育,后来在此成家立业,又一直从事大学师范教育,完全接受了扬州地方文化与最能范型表现儒家诗教的扬州传统文化,这种“无声的熏陶”,养育了他与扬州生死相依、脉息融通的情怀,一种“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的“本土性”。第三,出于对扬州社会的热爱与关切,率真潇洒、谦和交友的个性以及文学创作的激情,使他与扬州文化界的名士名儒、媒体记者等建立了亲和友善、志同道合的关系,为其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脉与信息资源。

惟其如此,张泽民才有可能在扬州这方热土上获得他的创作成功。而作家的身体力行,更彰

收稿日期: 2013-11-26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13SJB750019)

作者简介: 吴周文 (1941-),男,江苏如东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显了示范于读者的正能量价值。

二

张泽民的扬州情结表现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上,是以一种常人少有的关注与热情,自觉地把发生在扬州古城的一些重要事件和扬州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最具有道德价值与人性价值的“扬州好人”,作为其报告的对象。这是他创作题材的指向,也是自我诠释与释放扬州情结的自觉表现,进而表现了他作为散文作家的责任与时代使命。《一个震撼人心的午夜》,就是最好的例证。

《午夜》,是张泽民报告文学中的杰出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之作。毋庸讳言,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遵循“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理念,继承了延安文学“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传统,限制着作家创作的审美自由与创造才智的发挥。虽然如此,也不能以虚无主义的态度无视或全盘否定新中国 17 年文学所取得的正价值。以报告文学而言,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文艺报》发表了《充分发挥报告文学的革命威力》以及中国作协举办以报告文学的时代精神与作家的时代责任感为主题的座谈会之后,报告文学创作就出现了写新风(社会主义新风尚、共产主义新风格)、树新人(社会各个行业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的思潮与积极趋势。《午夜》就是在这种思潮与趋势中出现的、赢得声誉的一部作品。它与《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国青年报》记者)、《旱田不旱地——记闽南抗旱斗争》(郭小川)、《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穆青等)、《手》(巴金等)等等作品一起,成为讴歌 20 世纪 60 年代即共和国最华彩的前精神文明时代的一批报告文学优秀作品,为这种文体在曲折中的发展留下了时代的记录与烙印。《午夜》无疑可以看作 20 世纪 60 年代颂歌性“事件报告”的经典之一。这篇作品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留给文学史以“经典”价值。

第一,作品将恒久证明时代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是报告文学作家的最高职业品格。作者出于对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与对扬州生活“本土性”的关注,把即时报告“午夜”的突发事件,当作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必须肩负的使命,并且把这种责任与使命化作自己不可遏制的写作激情。故事发生在扬州 1963 年 6 月 14 日的午夜。当日下午

扬州某中西药店把两小包“滴滴涕”当作“小苏打”误卖给顾客,伤害生命的后果即将发生。这一警报发出后,整个扬州城打响了一场迅速找回这两包毒药的“人民战争”。照理说,这个关于“午夜”事件的文学报告应该由媒体记者或者专业作家来完成,而这篇文学报告却由当时高校的一位普通教师、作为第一作者的张泽民责无旁贷地“破门而出”,完成了这项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的使命。笔者曾经论述刘白羽肩负时代使命而创作的时候说过,其表现政治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所演化的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进而变成“个人生命中最根本的欲求,甚至变成了自我救赎的第一需求、变成了个人一生的精神有约与坚守”^[2],写作《午夜》的张泽民也是如此的内衷机制。他把报告“午夜”的事件的责任与使命,在道德与伦理的两重意义上,演绎成了切实实现“匹夫有责”的生命需求,创作《午夜》的灵感与激情也由此而生。

第二,《午夜》切入的思想视点,是具有哲学深度的家与国之间的伦理关系,而这种哲理性表达是报告文学家更高层次的思想追求。当年《文汇报》的评论员文章《人民安危重如泰山》认为,《午夜》有三个“充分体现”,即:充分体现了“党的伟大”、“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是“一曲动人的共产主义的颂歌”,“我国人民崇高的道德面貌的赞美诗”。《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为人辛苦为人忙》指出,《午夜》“展开了一幅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新型关系的画卷”,从市府到医药卫生部门的干部职工、从居委会主任到 70 高龄的老人甚至正在奶孩子的妇女,围绕着找回可能危及生命的毒药而为别人忙碌和辛苦,表现出可贵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境界。这两家评论基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创作理念与文艺服务于政治的颂歌思维模式,当其时无疑是符合政治文化批评要求的,也是无可厚非的。而今天以改革开放之后文学回归表现人性的原点、文学回归审美创造本体的理念,来重新审视这篇作品,笔者发现两家大报评论员的文章仅仅停留在历史拘囿的、不健全的理念之上,笔者认为,《午夜》是在哲理的高度上,表现与演绎着家与国之间的伦理思想:“午夜”的扬州,被作者作为“国家”的写真形象,既被象征与又被写实地进行了伦理化人

性的想象与思考：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提倡的“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只有保障实现这种理想服务的政权管理机制、只有社会所倡导的共产主义风格，才有可能有这一场挽救多条人命与拯救两个家庭灾难的“人民战争”的胜利，而且在短短的“六个小时”中把“误卖”的“滴滴涕”收回。“国”是“家”的根本保证。正如歌曲《国家》里所说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有了负责任的“国”，才有“家”的安康与幸福。反之，没有千千万万“匹夫有责”的小家，国之无存、国将不国。这种互存依存的关系，——超越事件本身的沉默的哲学底蕴，应该是20世纪50年之后的一个正确的、不沉默的解读。同时也启导现在，文学创造的无限与永久，往往应该最终指向哲理的演绎。换句话说，成为文学经典的最根本的要件之一，是人性表现的哲理境界。而当前一般报告文学作品往往缺失的，正是如《午夜》所彰显的如此的哲理性思考与升华。

第三，把《午夜》的艺术表现放在20世纪6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水准上考量，当属上乘之作。作品的艺术思维根据“六小时”事件叙述的需要，既要从繁杂的原始素材中提炼出最有代表性的细节加以呈现，同时又要将冗乱的细节进行动态的、符合读者审美悬念的逻辑整合，这就需要进行缜密的艺术构思与灵动的文本结构。惟其如此，作者以“寻找”两包滴滴涕作为叙事视角，采用了“开放式”的动态叙事结构：以时间、地点为逻辑时空的动态叙事中间，有机整合着多条线索的齐头并进，交织、闪回着警察、干部、店员、居民等在城里和郊区展开“大海捞针”的奋战画面，全方位地进行着“散点透视”，使得这种“桔瓣开花式”的多线蒙太奇组接，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年代，具有着在艺术表现方面的求异性与超前性。也就是说，《午夜》艺术形式表现中有着模糊的现代主义色彩（令笔者联想福克纳的《喧哗与躁动》等多角度展示的作品），这在20世纪60年代的报告文学中实属特立独行，是极少见的。它为其后以至当下的创作，提供了经典的、可供借鉴的经验。

正是由以上几个方面，显示了《午夜》作者不寻常的创作才智。

“文革”之前，张泽民还写过人物报告文学《于平凡中见不凡——记六圩派出所副所长丁乐昌》；1975年还写过报告江都水利枢纽工程（俗称江都抽水机站）建设的《水的主人》。进入新时期之后，17年间文学创作的理念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嬗变与演进，张泽民创作的步履也同样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学，回到了作家本位的“自我”。

张泽民的报告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个人署名和作为第一作者的作品有《衬衫王国的崛起》、《里下河的脊梁》、《橄榄绿，人们心中的长城》、《为了一个稚嫩的生命》、《坐标》等。这些作品依然是抒写作者的扬州情结，但是作者笔触所诉求的是，用他文学报告的个案，让读者以斑见豹看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在改革开放中所发生的历史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进而认知扬州人在改革开放中所焕发的、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认知扬州人为“创新扬州、精致扬州、幸福扬州”的目标，对古城进行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打造，推动了古城扬州的现代化的转型。作家告诉读者，告诉络绎不绝前来观光旅游的外地朋友，扬州不仅是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不仅是看上去在市政建设上打造“现代化”外观的古城，而且更是一座在“改革开放”这场雷雨罡风中获得新的生命与不可遏制的活力的城市。而在张泽民的扬州书写中，《衬衫王国的崛起》则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这篇报告文学写扬州著名衬衫品牌“琴曼”、“博克”、“虎豹”等如何在风风雨雨的市场竞争中诞生，继而又“作为扬州衬衫的代表，称雄首都市场”的真实故事。作者以此向读者报告扬州在腾飞。作品围绕“博克”等名牌在古城脱胎并在全中国打响的故事，完整地叙说这个铭写在扬州历史上的“改革”：从“从土裁缝”进北京大华厂“取经”，到江心洲“白马”的诞生；从“博克”到“虎豹”到“琴曼”诸多名牌的应运而生，到“群星灿烂”而形成“崛起”的扬州“衬衫王国”，这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扬州走向全国过程的描述，归趋于一次扬州正能量、正效应、正价值的爆发。以此揭示一个主题，唯有

改革才是硬道理，唯有在改革中遵循与运用市场的竞争规律，扬州才会有今天的崛起与腾飞。作者向读者报告的不仅是“衬衫王国”崛起的事件，他还以锐利批判的精神告诉你，奇迹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人的价值理念的嬗变；是因为颠覆了那种“吃不饱、饿不死”的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僵化理念、并且置换为市场经济与市场竞争这全新理念的必然。《崛起》刻画了像柏万林、蒋茂远、严恒山、薛玉国、陈学飞等一批企业改革家和开拓者，并且刻画了这个开拓者家族里的每位成员，都具有改革家所共有的思想与性格，作者则把他们的共性概括、形容为“冠军性格”和“大将风度”。显而易见，作者在事件与人物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叙说与描画中，笔力集中于“崛起”这个焦点与视角，以最大化力度书写 20 世纪 80~90 年代在纺织品精加工产业的一次猛进腾飞的扬州形象。正如作品所描述：“短短的四年时间，从一个厂变作十多个厂，从一匹‘白马’演化成‘虎豹’、‘琴曼’、‘富迪特’……林林总总，蔚为壮观。”从开头的“扬州——首都”、结尾的“扬州——母亲”的篇章修辞，笔者颖悟到作者国家想像的构思策略与国家想像的叙事指向：以一方水土的扬州讲“国家故事”，以“地方志”书写“国家志”，进而用隐喻修辞去引导读者跟着他去作强国梦的“国家想像”。可见，《崛起》在具实扬州的报告中，又在灵思翩迁中进行着更深更远的理性诉求与文本最大张力的表现。

张泽民报告文学的思想魅力，还表现在对扬州人当代精神世界进行了激情的书写。《里下河的脊梁》，报告的是 1991 年里下河所遭遇的一场特大洪涝灾害，所赞颂的是兴化、高邮、宝应、江都等数百万的“焦裕禄”们与“王铁人”们，用抗洪涝、救家园的钢铁意志，铸成了确保胜利的“里下河的脊梁”。毋庸讳言，在台风、地震、洪涝、瘟疫等等自然灾害面前，人类常常是难以逃避也是难以抗御的。但作者在这篇作品里告诉读者，这场洪涝之灾如果与 1935 年百万人历史大逃亡相比，却实实在在证明人的力量“有时”是完全可以与自然灾害抗争，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这个“有时”，正是精神力量所创造的、不可思议的“奇迹”。《橄榄绿，人们心中的长城》，是《里下河的脊梁》的姊妹篇，歌咏的是扬州公

安干警和武警官兵如何在特大洪涝灾难中把“橄榄绿”变成人民“心中的长城”；抱病忘生的朱启余、舍生取义的倪宏以及沈思、孙贵等等，在不平凡中表现了深度一致的“平凡”，把军民“鱼水情”的精神定格在“橄榄绿”上，成为一种永远的精神象征，在 20 世纪 90 年代演绎成为一种救赎众生的普罗米修斯的火种。如此温暖的文学表达，同样通过苏北人民医院朱亚彬、石维平等大夫救治患畸形心脏病的 3 岁孩子的报告（《为了一个稚嫩的生命》），通过扬州灯泡集团的当家人高仁林锐意改革、先忧后乐的特写（《坐标》），让读者既为作品中的人物及其崇高的精神所感动，又为作者流贯于字里行间的激情所感染和打动。

值得深思的是，张泽民对人物精神的“温暖”表达与言说，内裹有着文化批判的意义。改革开放带来的是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信息社会的大转型、物质生活的大提升以及价值理念的大嬗变。上世纪 90 年代这些诸多变化与发展，与之俱生的是诸多的文化悖论。我们必须正视，传统的伦理、道德、情操、人格理想等等，被麦大劳、酒吧、舞厅、肥皂剧、卡拉 OK 挤兑得几乎沉沦，这就需要文学来予以救赎，需要作家来坚守传统的精神伊甸园。于此张泽民与当下西方杰出的文艺家、美学家取得精神理想的共鸣。——他们把现代社会的道德完善看得比社会历史的进步更为重要，看得远比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科学的现代文明更为重要。正是在守望精神理想的意义上，张泽民与写作《假如我有九条命》的余光中、写作《想念地坛》的史铁生、写作《一个人的村庄》的刘亮程、写作《大地的事情》的苇岸等颇为相似。他将笔下的人物描写为精神理想的守望者与实践者，并且温暖地言说他心目中当今英雄人物的纯粹和高尚，言说真善美的传统性、现实性与无功利性。他们——当代的焦裕禄与王铁人们，对于今天那些沉浮于商海（钱本位）、官场（官本位）以及闲适场所（享乐本位）的精神被放逐的人们，是最好的醒脑“咖啡”，是当下物欲时代的“醒世恒言”。

笔者认为，只有作者自己被他描写的人物所感动，他的作品才能去感动他的读者。我们读张泽民的这些作品，完全体察其一颗温暖自己、最终温暖读者的爱心——他对精神伊甸园的坚守。

而这正是张泽民的作品至今依然能够打动读者，依然能够保持着一股正价值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四

张泽民以报告文学赢得声誉，同时又以其艺术性散文《咸亨酒店新主顾》、《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电视专题片《解说词》、《又是芍药花开时》等，获得紫金山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朱自清文学奖等奖项而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如果他的报告文学侧重于载道，那么他的散文则侧重于言志。言志即抒情。也就是说，他在新时期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抒情性质的散文。如果我们按常规思路从思想到艺术进行评论，自然也可以对其散文的特点、个性、风格进行深入的分析解读；但从张泽民的创作对当下散文的创作有何积极意义方面立论，无疑可以琢磨其真正的价值之所在，对讨论当下散文的创作添加有意义的话题。

他同时两栖于报告文学与散文。读其散文给我们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他把报告文学的许多表现元素移用到散文中来，似乎把报告文学微型化，使之成为更为精致的小品。也许，这对于作者来说并非是自觉而为。但是，作为作家创作的一种特殊现象，又是值得我们予以研究的。笔者考察残雪散文跨文体创作的经验时说过：她的很多散文，“它们是用小说化的情节叙事，以叙事演绎作者自己的情绪释放，进而很机智地结构成全新的、‘现代’特征。她向读者证明，散文也可以如此达到幽默诙谐的抒情”。^[3]由残雪借鉴小说元素，联想到张泽民借鉴报告文学元素，是有笔者的理由的。首先，张泽民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感与文体感写作，以这种文体的具实性显示形而下的形式感，以细节显示题材的真实原态性，以叙述语感显示作者的“在场感”。故此，他散文中的题材人物就像报告文学那样，在进行着“现在时”的客观叙写与评说，并且以文字叙述强调“第一次”的史识或发现。为中日友谊开拓道路的伟大使者鉴真、从几千年历史中寻找治国安邦谋略的毛泽东、为国家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惠美嫻、为故乡教育、医学慷慨捐助的香港商人辛德俊等等，这些在散文中抒写的人物与事迹，是被报告文学的形式感所言说，在客观报告的意义上重新获得了真实性和新闻性的审美诉求。其次，

张泽民在写作散文时又将报告文学进行了必要的、灵动的散文“抒情”的格式化（形式化）处理，在散文的意义上把酷爱的文体，变通地做到了散文的精致；把多向叙述、细节铺垫、气氛渲染、时空熔裁等等的宏观驾驭机制，删繁就简，变成了简练与含蓄的表达，最终在其笔下，把报告文学与散文这两种文体形式浑成为一。例如，《滦县历险》是作为一件事件被“报告”的，把它看作一篇微型小品也完全可以，因为它的叙事方式与叙写内容的“叙述”处理，脱不了报告文学的形式感。然而，它毕竟是叙事为本位的抒情散文，流贯于文本的，是被强调的自我抒情，是在一场历险中“我”与“他人”的情感交流与碰撞，终极抒写的是我的感动，并把自己的这种感动流漾于字里行间。最简单说，读者从张泽民的一些命题如“莲花巷口的思念”、“愿作故乡一捧土”、“藤花馆前忆故人”、“又是芍药花开时”等，便可以看出作家对作品形式化最初的诗性处理，依然是以自我抒情为本位而进行构思的。在讨论张泽民散文跨文体的形式表现之时，我们有必要认识形式其对文本操作的至关重要。正如苏珊·朗格引用普鲁斯特的精彩论断所表达的思想：艺术杰作之所以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而在于它们的表現的形式……我指的是艺术家创造的东西，不管你把它称作有意味的形式还是称为别的什么，艺术最重要的是形式性的，艺术创造必须与次序、连续、动作和形态等等打交道”。^[4]所以，形式创造对于散文的精致来说，永远应该是作家的孜孜以求。舍此，便没有散文艺术的美丽创造。在评论、欣赏张泽民散文的时候，这应该是给当前散文创作的一个很有益的启示。

张泽民跨文体的实践，不仅之于报告文学，而且他还从小说文体“拿来”自己需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不仅“拿来”一般小说的艺术形式，而且还“拿来”现代主义小说的某些表现技巧。《咸亨酒店的新主顾》，就是新、奇、怪的一篇很另类的作品。这篇散文以作者到绍兴重新开业的咸亨酒店（作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的一项活动）的所见所闻，去感受鲁迅故乡的酒文化，进而在时代变迁的风风雨雨中感受与反思改革开放初期绍兴变革的风情。作者构思的机智在于，把自我诗意的感受浓缩于咸亨酒店这既定的视阈，叙写包括“我”在内、包括回祖国定居的台湾马

壁教授在内满堂宾客品酒的喜庆场面。有了如此的构思,如按传统作法,只要把场景中的气氛、人物及喝酒的情节进行叙写与渲染,并注意选择、提炼一些表现风俗风情的细节,就可以做出文章而且完全可以做出一篇很不错的文章。然而,作者不满足于传统的作法。他从外国现代主义小说那里借来了“意识流”的技巧。在把咸亨酒店作为整体艺术表现的视阈而外,又同时奇崛地揉合意识流手法,予以进行整体表现的“意识流”叙事。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一张张似曾相识的脸孔,勾起我连绵的遐想,历史和现实叠印在一起,一时竟难以辨认……。”于是,鲁迅笔下的诸多人物,如:六一公公、闰土、水生、孔乙己、涓生、华老栓、贺老六、七斤单四嫂子等等,在作者的自由遐想与自说自话中悉数登场,即用“意识流”的“自由联想”与“内心独白”两大特征,完成了从孔乙己时代、“批判孔乙己”时代到眼下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穿越;并且同样以“我”的意识流动,让酒店的宾客与鲁迅的人物“叠印”,显然是借用了现代荒诞派与新感觉派的悖谬,如此又为作品增添了几分荒诞与“感觉”的色彩。惟其如此,作品在历史穿越的断断续续之中,在给孔乙己的冤假错案甄别的当下,完成了借咸亨酒店的视阈所进行的“历史比对现实”的反思。值得读者注意的是,这篇作品发表于1983年第4期的《钟山》杂志,在整体文学理念尚未彻底转变之前(一般认为此转变为1985年),就在王蒙(如小说《夜的眼》、散文《桔黄色的梦》等)、郭风(如《在雨中,我看到蒲公英》)、徐开垒(《忆念中的欢聚》)等少数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开始运用“意识流”等现代派手法,借鉴与融会外国现代派方法与手法还处在始作俑的初始阶段,张泽民《主顾》的现代手法尝试成功并获得大奖,得到了评论家与读者的认可,实属非常难能。且不论台湾余光中的散文中多种“现代”手法对大陆散文的影响,但可以肯定地说,这篇散文的“现代”手法,与王蒙、郭风、徐开垒等一起形成了一种合力,对当代散文创作无疑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他们对散文创作的震撼无疑是告诉人们,在改革开放之后散文文体的创造也应该进行跨文体的“改革开放”。张泽民的创作思想正价值给我们如下宝贵的启示:散文只有向现代主义文学开放与借鉴,才有自己非

常的、独立的创造。正如鲁迅所说,“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5]。

除跨文体的诉求而外,张泽民散文的艺术诉求表现在多个方面,集中到总体上的印象,是把自己的作品创造成为“美文”。散文家卞毓方批评余光中的散文说,他“是用‘叙事’来写散文的,可以读十遍、二十遍,但是,余光中先生的文章过于强调修辞,读者被他华美的词句所吸引,失去了对主题的把握”^[6]。张泽民也如余光中那样以“叙事”来写散文。不过,他爱修辞,爱华彩的修辞,但没有太过。在具体操作之中,注意艺术表现的分寸感。讲构思,他避免精巧;讲结构,他避免矫情于“峰回路转”;讲抒情,他避免激情的“山呼海啸”;讲叙议的揉合,避免理胜于辞……。总之,由作品思想与抒情的吁请,对各种艺术形式及方法技巧的使用与整合,他都注意做到恰到好处,准确到位,以表现分寸的把握,达到和谐(即中和之美)与弹性、柔性的统一。

文如饭,诗如酒。读张泽民的报告文学与散文,相信读者会产生强烈的欣赏饥渴感,更会诱发你的满怀诗情。因为从根本上说,张泽民的文章品质是诗性的,充满艺术性的,而“艺术的本性是诗”^[7]。尽管读者没读到他的诗作,但笔者认为,他就是一位拥有不凡智慧与充沛激情的诗人。

参考文献:

- [1]张泽民.《岁月履痕》自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 [2]吴周文.肩负时代使命的刘白羽及其散文的正价值[N].文艺报,2013-8-26(05-06).
- [3]吴周文,林道立.现代主义与诗性之沉浮——一个现当代散文史识的发现与描述[J].上海文学,2013(9):106-112.
- [4]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347.
- [5]鲁迅.拿来主义[M]//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47.
- [6]卞毓方.“美”和“妙”——我的散文观[M]//江力.中国散文论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0.
- [7]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70.

Positive Energy in the Conception and Art of Zhang Zemin's Prose

WU Zhouwe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Jiangsu, China)

Abstract: “*A Movingly Shocking Midnight*,” a reportage written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y Zhang Zemin, is a classic piece of work in the 17-year literal histo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the new era, “*The Rise of a Shirt Empire*” and his other works represent the senior writer’s emotional connection to Yangzhou. Conceptually, Zhang narrates the national history in the form of a local history and seeks for the maximized tension in his texts. Besides, he stresses warm expression of the spiritual world of his protagonists. Zhang’s prose experimentally combines reportage and fiction manifesting proper balance in many aspects, which brings his works poetic harmony.

Key words: Zhang Zemin; reportage; prose; classic; trans-genre

(责任编辑 丛 琮)

(上接第 34 页)

On the Mental Damages Compensation System in State Compensation

YANG Xianbin¹, JIANG Yufeng²

(1. KoGuan Law Schoo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2. Qingyuan Court, Qingyuan 323800,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The thirty-fifth provision of the new revision of State Compensation Law provides that victims should be paid a corresponding amount of “consolation compensation concerning the mental damage” on condition that country tort behavior leads to “serious consequence” towards them, which brings the 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into the scope of state compens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However, in dealing with the concerned cases, the agencies liable for compensation and the judicial personnel are in lack of practical guidance in judicial practice due to the lack of specific standards of 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Taking for example the case in which the uncle and nephew are charged with raping the victim to death, the compensation for mental damages is up to 450, 000 yuan. This verdict has aroused endless questioning as regards its rationality and legitimacy. It is proposed that our 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system should be perfected by absorbing the reasonable part of the counterpart system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e principles to be followed should include: State 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be no less than that of civil 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the sum of compensation be restricted to a certain limit; judges be granted independent judgments;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serious consequences” be taken as the basis for judging the seriousness of the state tort behavior; the sum of compensation be adjusted on the basis of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responsibility recovery be implemented.

Key words: state compensation; 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analysis; re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鈇 云)